

中国援助话语的历史演进与当前困境^①

胡 美

【内容提要】在 58 年的援非史上，中国的援助话语经历了从政治话语到合作话语再到发展话语的曲折变化，反映了中国援非从一个政治工具到合作载体到发展手段的多重变化历程。在半个多世纪的话语历程中，中国的援非话语从沉默到独白到众声合奏，话语兼具了经典性和创新性两个向度特征，话语的主语从中国日益向中非双方转化，伴随着这一语法结构的转变，中非日益形成一个话语共同体。当前，由于缺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援助话语、现有的援助话语渗透力不足、话语生产和话语策略上存在较为明显的漏洞，当前中国援非话语面临较为严峻的问题与挑战。

【关键词】对外援助 话语 中非关系

【作者简介】胡美，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国际援助与非洲发展问题、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

在 58 年的中非援助交往中，中国围绕着援非主题的言说，产生了不少言论，这些言论中的许多成为了经典的政治话语，成为中国援非的政策和原则，影响了中国的援非政策，并成为了中国重要的外交话语。随着中非交往的加深和交往面的拓展，中国和非洲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利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援非五十年与中国特色国家援助之理论总结与实践创新”(11CGJ022)、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专项课题“中非援助合作关系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困境研究”(14FZZX26YB)的阶段性成果。

益交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讲，中非正在逐渐成为一个话语共同体。

一 中国援非的话语历程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话语既是一项权利，也是一项权力，是国际行为体用来表达其国际行为的言语表征，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对外援助实践的徐徐铺开，思想理念与原则精神随之形成并逐步完善，其话语体系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建构起来。作为一种特殊的国际资源和国际权力，中国援助话语的建构，根植于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援非实践之中，根植于中非共同谋求国际生存空间的过程中，根植于中非共同追求发展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

中国对外援助的步伐从新中国成立就开始起步，对中国援外制度的探索在那时就已经开始，然而，有效话语的诞生则要更晚一些。在1964年第一份援外文件公布之前，中国的对外援助已经开展了十五年，而中国的援非也已经开展了八年，中国的援外话语与中国的外交话语具有重合性，真正有效的援助话语并没有诞生。这一时期的对外援助是作为一项普通的外交政策而执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代为行使了中国援非原则的使命。毛泽东曾这样表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①

1963年，周恩来首访非洲过程中公布的“八项原则”成为了第一份具有话语意义的援非政策文件。此前，中国已与许多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和援助关系，在长期的援助实践中，中国的援非的特色在实践中特色彰显。鲜明的特色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非洲国家的欢迎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即便在当时的西方学者看来，“援助是北京和非共产主义世界保持联系的主要形式之一”，但援助中的很多做法是值得欧美等援助国“效仿”的^②。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187页。

^② Peter Andrews Poole, Communist China's Aid Diplomacy, *Asian Survey*, Vol. 6, No. 11, Nov., 1966.

中国援非的这些立场和原则只是渗透和贯彻到大量的援非实践之中，并未付诸文字和言语，因而，难以通过言语和文字来循迹中国政府在早期援非中固守的原则。产生于大量援非实践基础之上的援非话语，“八项原则”是对此前中国援助的一个总结性的提炼，也是对未来中国援非的一个宣示。“八项原则”的话语谱系不同于西方，倡导了一种全新的国际关系的理念和原则，对此，西方学者极为震撼。“对于这个拥有如此高尚对非关系原则的国家，我们不得不表示最高的敬意和最深的感激。”^①

“八项原则”中的诸多内容成为了中国援非话语中的“元话语”，中国援非中的很多话语都是由这一话语生长和引申出来的。这一地位的奠定来源于“八项原则”前中国对中非关系和中非在国际上的身份和地位的认定上。“八项原则”这样的认知和原则具有代表性，通过亚洲和非洲国家的互相支持和互相帮助，可以实现亚洲和非洲单个民族所不能达成的历史使命，让双方的发展优势在合作中融合，已经逐渐地变为一种颇有影响力的新的社会思潮。与之相呼应的，非洲国家在谋求民族独立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曲折推进，自觉不自觉地为中国援非注入了产生当代国际交往因子的充足必要性，这也促使着中国不断创构其援非原则。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中国“对外援助的出发点是，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支援兄弟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支援未独立的国家取得独立；支援新独立的国家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巩固自己的独立，增强各国人民团结反帝的力量”^②。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援助工作是围绕着亚非国家的解放事业而展开的，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立意和落脚点与其说是经济的，还不如说是政治的，因而这一阶段的援助话语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伴随着中国援非影响力的扩大，“八项原则”中的若干话语为外部世界所熟悉，如无偿援助、不求回报、国际义务、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援助是相互的、平等互利、自力更生等，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援非的代表性话语。

作为一项长期践行于中国和非洲发展实践之中的援助话语，并没有凝固在固定的话语模式之中，而是随着中非之间围绕着援助与合作而展开的实践活动而在动态中不断演化。围绕着如何探索中非间的取长补短和互补

① Emmanuel John Hevi, *The Dragon's Embrace*, Pall Mall Press, 1967, p. 9.

② 石林 《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44页。

互助，中国援非伴随着中国走过了改革试水到改革深化的漫漫征程。进入20世纪80年代，“非殖民地化”进程终结，非洲统一组织通过《拉各斯行动计划》，标志着非洲国家已经将经济发展放到首要位置上^①。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任务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对外政策也反映了其经济上的考量，对外援助计划也被视为从属和服从于国内的经济建设^②。围绕着探索新的援助方式和更有效利用现有的援助资金，中国政府启动了援助资金的单向流动向“有益于双方”的合作的改革。因而，新时期中国对非援助与合作的新方针“四项原则”强调，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改革的集中表达，是中国政府结合国内经济和改革开放经济政策而进行的援外政策调整和改革。这种理性和务实的政策取向与当时第三世界寻求经济发展的呼声不谋而合。中国的援非进入了以探索多种形式的“合作”为主题的新时代，围绕着合作而产生的各种创意和元素融入中国援非的话语体系之中来，合作共赢、形式多样、技术合作、合资合作、管理合作、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等成为新时期的典型话语。作为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在援外领域的尝试，合作话语是中国援非改革中的探索，丰富多样的合作创新为中国援非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此后，围绕着技术合作、合资合作和管理合作等，中国和非洲积累了丰富的合作经验。

合作方式的改革和合作话语是中国援助与合作改革进程中的一种探索，其最终的目标是指向中国和非洲的发展。伴随着合作为主题的援助时代的开启，非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其主要挑战不是与殖民主义斗争，而是与贫困和落后作斗争，实现经济独立”^③。在这个合作的新时代，中国和非洲共同启动了一个新的合作平台，即中非合作论坛。中非援助与合作进入了论坛新时代，围绕着中非共同发展的共同愿景，中非共同探索实现发展的密码和钥匙。中非空前全面而深入地介入对方的发展当中来，围

① Ian Taylor, “China’s Oil Diplomacy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2, No. 5, p. 49.

② Kristian Aamelfot Kjøllesdal, *China’s Foreign Aid in Africa: Challenging the Norms of Foreign Aid*, Centr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Microfinance (MICRO), *Studies in Development Management*, No. 5, MICRO 2009, p. 23.

③ 梅莱斯 《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译文)，2006年11月4日，http://www.gov.cn/ztl/zflt/content_432958.htm。

绕着发展主题而产生的话语蓬勃繁盛，中国在非洲扮演着一个日渐“正面而备受赏识的”角色^①。全新时代帷幕的拉开进一步开拓了中国援非的思路，援助与合作关系不再拘泥于援助或合作，转化为谋求双方发展而采取的丰富多元的路径和方式，中非之间的话语实现了从各类型的合作到各类旨在促进发展的途径拓展，从能力建设到民生改善，从组合贷款到创造性合作模式，从发展模式到成功经验，从基础设施建设到人力资源培训，从孔子学院到志愿者派遣等都成为了这一时期中非间的新语汇。新时代发展话语的勃兴，越来越多的话语进入援非话语体系，如伙伴关系、发展伙伴、南南合作、联合自强、合作共赢、互利双赢、共同发展、减债免债、多边合作、命运共同体，等等。

作为中非双方共同的历史使命，发展不仅为中国所追求，而且也为非洲所渴慕。论坛时代，非洲史无前例地参与到中非互动的历史和动态当中来，也更为主动地把握到中非合作的脉搏和话语建设当中。这一时期的援助话语不仅仅是中国的声音，而且中非双方在话语中的均衡配合、互为主体。作为“一个以平等互敬为基础的互利合作新范本”^②，中非合作论坛是一个“集体协商和对话”的平台，将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放置于与中国领导人同样的地位上，这样一个平台在西方政府看来是不可思议的^③。在这个共同的话语平台上，发出声音的不仅是中国的话语，而且还展示和体现了非洲国家的意志。在中非合作论坛这个平台和框架内，非洲的声音不仅能够表达出来，而且能够得到中国的尊重和认可，且每届中非合作论坛发表的行动计划和会议宣言，成为中非共同发声的一项重要的重要途径。

二 中国援非话语演进的特点

在中国的五十多年的援非历史进程中，其话语结构在若干层面经历了过渡和变迁，中国援非话语随着中国援非的这种变迁是观察中国援非话语

^① Ian Taylor,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Routledge, 2011, p. 34.

^② Li Anshan, Liu Haifang, Pan Huaqiong, Zeng Aiping and He Wenping, *FOCAC Twelve Years Later: Achievements, Challenges and the Way Forward*, Peking University and Nordiska Afrikainstitutet, 2012, p. 9.

^③ Ian Taylor,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Routledge, 2011, p. 48.

产生和演变的重要依据。具体说来,这些变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从沉默到独唱再到众声合奏。

考察整个中国援非史上的话语历程,中国援非话语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发展中变化,大致说来,经历了从沉默失语到中国独唱再到众声合奏的变化历程。

由于话语的缺席,中国早期援非处于沉默失语的状态。在“八项原则”公布前,中国的援非已经走过了8年,却没有公开中国的援非政策,在接见非洲国家领导人时,中非之间有较大关于援非的话语,在公开的场合中国很少有援非方面的声音和话语,这些话语虽然频频出现于中国的报刊,但其传播力非常有限。因而,在世界看来,中国在援非问题上表现为沉默失语的状态,然而,中国在援外政策上的失语并非代表中国在外援上无所作为。在这8年的时间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代为行使了中国援非原则的使命。作为一个普遍的外交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规定的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其原则并未具体和细化到援助执行中的具体层面。这些在实践中一再被贯彻和实施的原则,没有以文件的形式公之于众,所以给外界造成了中国援非话语缺失的假象。

援助话语的缺失并不意味着援非实践的滞后。在8年的沉默中,中国在非洲援建的大小工厂先后投入生产,一些国家的编织业和茶叶种植业等技术工种也发展起来了。这些援助不仅在非洲受到高度赞扬,而且在西方学者眼中,虽然是“为赢得朋友和友谊”的外交工具,但其所体现的“中国风格”已被视为一个“典范”^①。这些评价不仅是对援非实践的认可和赞同,而且是对其所坚持的原则理念的赞许。即便如此,援助话语的严重不足依然带来了较严重的问题,即这些政策和原则只是内化于援助过程之中,而不是外化为可以交流和传播的言语和文字,政策和原则需要在实践中慢慢体验,而言语和文字则以直观的形式更快捷地实现沟通。这种沉默最终在非洲的要求下被打破。1963年周恩来首访非洲之前,中国援非话语的缺失引起了正在接受中国援助的非洲国家的不安,也引起了准备接受中国援助的非洲国家的兴趣和好奇,第一份具有话语意义的援外政策性文件“八项原则”就在这一背景下诞生。

“八项原则”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摆脱了援助的“无声”时代,转而寻

^① Wolfgang Bartke, *China's Economic Aid*, New York, Holmes & Meler Publishers, 1975.

求方便沟通交流的话语途径。无论是“八项原则”时代的政治话语还是“四项原则”时代的合作话语，中国的援非围绕着非洲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问题而展开，中国的援非也是在中国和非洲的充分沟通和互动的基础上展开，但在话语形式上，采取了以中国为主的独唱，中国是援助话语中的声源和主角。由此可见，这份文件从立意到表达，都是围绕着对外援助和受援对象的发展事业而展开的，但受援对象只是作为一个受众出现的。在独唱的话语表达形式中，展现的是中国话语的单向传播，作为听众的非洲并不能有效发声，或者仅仅只能作为一种伴奏或陪衬。

进入 21 世纪，中非合作论坛这一平台的诞生彻底改变了援助话语生产和传播模式。论坛让中非拥有了一个机制性的对话平台，让中非规律性周期性地会面，并展开圆桌会议式的平等讨论和交流^①。对话是双向的沟通和互动，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倾听，这一部分却往往因为话语主导方的主导而被忽视。论坛让中非双方有了更多的沟通机会和话语表达机会，话语表达的形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由独白走向了全面的对话。对于这一创新性平等对话所能带来的双方有效互动和交流，作为中国援非旁观者的西方国家屡屡表示怀疑，“中国完全控制了整个过程，从日程的设置到宣言的起草和会议的总结”^②。实际上，中非合作论坛在实践中坚持在论坛中围绕着双方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而进行调研和充分讨论，确保所通过的行动计划充分体现最新的发展动态和发展需求。从已有的五届论坛来分析，从会议召开的过程到所通过的文件文本，均采取对话的形式，中非之间的平等沟通和对话已经从形式全面渗透到更深入、更全面和广泛的实际内容中来。

受到传播途径等方面的限制，在进入 21 世纪之前，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中非话语的发声源主要来源于中国和非洲国家的政要和政府，他们的话语也是今天的研究者获得援助话语信息的重要来源，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官方身份增加了获取援助话语信息的难度^③。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展开，中非关系日益成为了一个多面综合体，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的组织、团

① Ian Taylor,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Routledge, 2010, p. 11.

② Ibid., p. 100.

③ Sven Grimm, Rachel Rank, Matthew McDonald and Elizabeth Schickerling, *Transparency of Chinese Aid: An Analysis of the Published Information on Chinese External Financial Flows*, London: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at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2011, pp. 24 - 31.

体和个人参与到中国的援非事业当中来，他们成为了中国援非话语的另一个渠道。来自民间的话语具有非同寻常的话语力量。2003年，中非企业家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了第一届中非企业家大会。2010年海南万宁召开中非合作圆桌会议，2011年第二届中非合作圆桌会议颁布了《万宁宣言》^①。民间话语汇入中国援非的话语系统之中，增添了中国的话语渠道，它们所讨论的问题日益成为中国援非话语当中的新元素和新音符。伴随着话语形式的这一变化，援非话语的发生途径从官方独奏到官民合唱。

通过援非，一些语汇与中国援非建立了特殊的联系和纽带，成为中国援非的新名词。中国自1964年开始向非洲派遣医疗队，派遣中国的医务工作者为非洲人民看病，在一些非洲国家人民的眼里，“中国医生”成为了他们的保护神。看“中国医生”成为他们寻求健康和疗愈的一个特殊词汇，有些病人为感激中国医生挽救了他们的生命，给自己取名“王医生”或“李医生”等。这样的民间话语具有了特别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传播了中国的援非美誉。肯尼亚一位孕妇感染了疟疾，在面临流产或畸胎危险之时，中国援助的“科泰新”成功救治了她，保住了婴儿的安全和健康。为此，她给孩子取名为“科泰新”^②。友谊医院、东方红广场、孔子学院奖学金、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等都成为了非洲人民心目中中国援助的代名词。今天，越来越多的援非项目被当地人冠以中国名字，成为了中国援助在非洲的另一道话语风景线。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当地政府将中国人修筑的一条道路命名为“北京路”，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中国人修筑的机场大道被当地人称为“长安路”。卢旺达基加利城市道路重建项目建成通车后，当地人亲切地将这条道路为“中国路”^③。这些都成为了与中国援非相关的标志性的话语，成为中国援非在非洲民间的响亮口碑。

中非援助关系不仅听到了来自中国和非洲的声音，而且还听到了来自西方国家的传统援助者的声音。西方的声音有赞同的，但更多的声音是批

① 《中非合作圆桌会议发表〈万宁宣言〉》，2011年11月10日，<http://tv.people.com.cn/GB/166419/16208191.html>。

② 《深入非洲大陆的友谊、合作之旅：记胡锦涛访非洲八国》，2007年2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2/10/content_5724770.htm。

③ Kenya: Road Construction Projects Boost China's Image in Kenya, July 8, 2013,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307082170.html> 《“中国路”扮靓卢旺达城市基础设施》，2013年3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3/15/c_115036759.htm。

判和反思的声音。美国学者莫伊斯·莱姆 (Moises Naim) 强调, 中国的援助注定带来非民主和不透明, 是“有毒的”, 甚至称之为“流氓援助”^①。由于中国从非洲大量进口包括石油在内的原材料, 并向非洲国家销售工业制成品, 这种模式与历史上的所谓殖民主义具有表面的相似, 西方将其炒作为“新殖民主义”^②。与此相关的提法如, 中国的援助破坏了西方在非洲所进行的民主和人权等方面的努力^③。西方对中国各种抨击只是反映出西方对中国在非洲快速崛起的“心理不适症”^④。用一位非洲学者的话来说, “在过去的两百年时间里是北南制导的时代, 而当前全球秩序开始走向新的平衡, 东南关系获得了重要性, 并隐含了解放的潜在含义”^⑤。美国学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却坚持, 中国的援助看起来并不是特别“有毒”, 也并没有使非洲的治理恶化^⑥。由此可见, 这种话语的影响力并不在于其真实性, 而在与其煽动性和感染力。无论如何, 这些声音也成为了中国援非话语中的一个重要的片段和插曲。

无论是中国的政策话语, 还是非洲民间关于中国援非的声音, 或者是来自西方的“酸葡萄”话语, 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援非话语的主要图景。来自中国的声音、来自非洲的声音、来自官方的声音、来自民间的声音, 共同汇聚成了一曲雄浑有力的援助与合作鸣奏曲, 其主题是中非合作关系, 其旋律则是中国和非洲的发展密码的找寻。

第二, 中国援非中的核心话语在传承中不断创新。

中国援非的一部分核心话语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而一部分话语则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创新。58 年的中国援非历史中, 中国援非中的一些原则

① M. Naim, “Rogue aid”, *Foreign Policy*, 1 March 2007,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07/02/14/rogue_aid.

② 《BBC 评论: 中国崛起对西方是祸是福?》, 2006 年 11 月 8 日, http://finance.ifeng.com/news/opinion/200611/1108_196_29949.shtml.

③ Joshua Kurlantzick, *Beijing's Safari: China's Move into Afric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Aid,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Carnegie Endowment Policy Outlook # 29, November 2006; Human Rights Watch, *World Report 2007*,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2007.

④ 《专家: 西方对中国与非洲关系“羡慕嫉妒恨”怎么办》, 2011 年 12 月 23 日, <http://world.people.com.cn/GB/16695202.html>.

⑤ J. Nederveen Pieterse, “Global rebalancing: crisis and the East-South tur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2 (1), 2011, pp. 24–48.

⑥ [美] 黛博拉·布罗蒂加姆 《龙的礼物: 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 沈晓雷、高明秀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20 页。

之所以能够持久延传，因为这些原则总是传递着一种历史过程中相对稳定的、保持着中国援非政策稳定性的因素，它们代表着中国援非中一以贯之的原则和理念。在援非话语中，有很多话语历经多年都没有变化，如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等，这些话语在半个世纪的援非征程中得以保留和承继，成为中国援非话语中的经典语汇。

作为一项基于实践而建立的话语体系，中国援非的经典话语是一代代中国援非人在实践中践行而得到延传的。平等虽然是一个话语，但并非仅仅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中国援非人在实践中忠实恪守的信条。中国在1961年底向马里派出第一批农业专家，他们在工作实践中就展示了与法国专家截然不同的平等风范。为专家做饭的是一位曾服务于法国专家的老厨师。他看到法国专家住在别墅，从来不下地，尊称他们为“老板”；看到中国专家住宿条件较差，房间内没有空调，每天跟农民一样汗流浹背地在地里劳动，收工回来两腿沾满泥水，从不认为他们是“老板”。由于中国专家与他们此前见到的西方专家不一样，因而也引起了当地人对中国专家的误解，加上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一开始，当地人以为这些甘愿吃苦的中国专家因国内没有工作，到马里来找饭吃。了解真相后，马里人民真正认识到中国专家是与西方专家完全不一样的新型专家^①。可见，援非话语中的平等并不是停留在外交文件中的语句，而是种植在非洲民众心中的平等感受和体验。据中国派往马里的甘蔗专家唐耀祖回忆，当他第一次走到甘蔗田里时，马里工人看到中国专家和他们一样光着脚踩进泥土里的时候，面露惊讶之色。最初马里工人还按照过去称呼殖民主义者“专家”一样，称中国专家为“先生”，不久以后，马里的工人不再称“先生”了，他们亲切地叫“同志”^②。这种平等的精神和姿态一直传承至今。2000年以来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人和非洲人以圆桌会议的形式召开会议，取消了主位和次位的区分，使得参与论坛的每一个国家均作为平等的一员，各方的意见都在论坛中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倾听。用非洲人的话来说，“中国人带着共同的经历来到谈判桌前以平等的身份对待非

① 江翔 《我在非洲十七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② 孟庆涛 《中国援助非洲忆往》，《档案春秋》2012年第1期。

洲人。”^①

中国援非中若干话语元素的传承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创新也是中国援非的主旋律,一部分核心话语在开放中不断创新和向前推进。1964年公布的“八项原则”中,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关系的主题词是援助,到1982年宣布的“四项原则”强调中非之间的合作取代援助。从“四项原则”的措辞来看,四项均以“中国与非洲的经济技术合作”作为每一项的开端,标志着中国从强调援助向强调合作转变。合作的双向互动结构取代了昔日援助的单向灌输。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的援外方针继续调整,中非之间平等互助的对等援助关系为中非建构起“共济互助”的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互相援助逐渐为相互间的平衡合作所取代^②。在中非间越来越多的合作和互动中,中国更多的是关注如何更好地为非洲的发展提供资金,而不是这种资金是否是国际社会所认可的“援助”^③。虽然说,中非之间的援助更多地被合作所取代,但援助并没有消失,而是用合作的形式来丰富中非援助的内涵,援助的实质内涵更趋丰富。因此,各类形式的贷款、融资甚至是混合类的借贷纷纷出现,成为了中国援助的日常表达形式。从双方合作的形式来看,不再强调整齐划一的援助与合作形式,转而强调和关注充分考虑到双方的时机情况和现实需要,强调因地制宜,合作的触角进一步深入双方的各个领域。从合作的形式上看更为具体和多样化,包括提供技术服务、培训技术和管理人员、进行科学技术交流、承建工程、合作生产、合资经营等,这是中非援助和合作领域的开拓性思路,丰富了中非合作的方式和路径。

从中国从援助中的利益原则来看,中国从强调无偿和不求回报到强调双方的互利共赢。在“八项原则”中,中国强调“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中国早期的援助多以无偿援助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在提供援助时是不求回报或者很少求回报的。在中国向埃及提供第一

① [南非] 莉吉纳·阿玛迪 《非洲领导人的三副面孔》, [美] 沙伦·T. 弗里曼(主编):《中国、非洲和离散非洲人》, 苏世军、苏京京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第302页。

② 胡美、刘鸿武 《中国援非五十年与中国南南合作理念的成长》, 《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 第22页。

③ Deborah Brautigam, *China's African Aid, Transatlantic Challenges*,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9, p. 21.

笔援助时，中国强调援助不求回报，“我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你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我们可以给无代价的援助”。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无偿的援助并不是对非洲国家的怜悯而给予的施舍，更无意挑战其民族自尊，因而，毛泽东同时表示，如果埃及出于民族自尊而要偿还，“现在可以记账，以后再说，或者过了一百年以后再还吧”^①。改革开放后，中国对非援助从不求回报向关注双方在合作中的合理经济效益和经济回报转变。“四项原则”中强调，“合作之目的在于取长补短，互相帮助，以利于增强双方自力更生能力和促进各自民族经济的发展”。“四项原则”强调援助中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合作中不仅关注受援对象非洲的经济获益，而且还首次强调了中国在合作中的经济回报。

随着中非合作的深化，为真正实现最大限度的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中国政府强调在合作领域的拓宽和合作方式的创新。每一个合作新领域的开拓，都成为了双方创造新的发展空间的新起点。中国更多地强调双方非洲在中非互动中的共同获益，让中非双方从对方的发展中充分获益。德国马克银行在 2006 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未来的十五年里，中国将对商品保持浓厚的兴趣，它预见到 2020 年，中国的需求至少增长一倍以上^②。苏丹 1995 年对华出口占出口总额 10%，到 2006 年，这一比例为 70%。而布基纳法索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对华出口几乎为零，到 2006 年，对华出口占到其 1/3 以上，几乎所有的棉花都出口到中国^③。随着中国中产阶级队伍的逐渐壮大，旅游业和服务业成为非洲的新兴产业和中非贸易的新增长点。自 2002 年埃及成为非洲第一个中国公民自费旅游目的地之后，现有 26 国成为了中国自费旅游目的地^④。法国原本是埃及最重要的五大游客来源地之一，但现在法国游客减少了近 30%。2011 年，中国赴非洲旅游人数达 100 万人次。2012 年赴非的中国游客比 2011 年增加了 56%，

① 《中国人民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1956 年 9 月 17 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49 页。

② Tamara Trinh, Silja Voss, “China’s Commodity Hunger: Implications for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Deutsche Bank Report, Deutsche Bank, 2006, p. 1.

③ “Never too Late to Scramble”, The Economist, 26 Oct, 2006.

④ 《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北京行动计划（2013 年至 2015 年）》，2012 年 7 月 23 日，<http://www.focac.org/chn/zxxx/t954617.htm>。

其中赴肯尼亚游客达 4.1 万人次，赴南非的游客超过 13 万人次^①。中国正日益成为非洲旅游的重要客源。

正是伴随着中国和非洲在越来越多的层面上展开了紧密的合作与互动，中国和非洲之间的生存空间、发展前景和利益等越来越紧密地与对方联系在一起，因而中非之间从“朋友、兄弟和伙伴”发展为“命运共同体”。在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之初，众多非洲国家处于民族独立斗争的关键时期，中国给予非洲的支持和援助是围绕着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而展开的，而民族独立和民族政权的巩固是当时中国的重要政治任务，因而，中非结成了坚定的政治盟友。1956 年，中国向埃及提供第一笔援非物资时曾这样表示，中国不能坐视埃及的领土主权遭受到任何形式的侵犯，“愿意尽我们的能力所及，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包括物资援助在内，支援埃及的斗争”^②。20 世纪 80 年代，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完成了民族独立，国家的使命从政治向经济转化，双方的话语也从政治话语向发展话语转化。发展主题的凸显让中国和非洲重新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可以获得发展能量、激发发展灵感的合作伙伴，中非对这一关系的定位也在逐渐地调整之中。2006 年，中非关系的定位升级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非之间从政治命运的同舟共济转向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全面均衡的方向转化，开始强调双方通过互动而平衡获益。伴随这一转变，中国创造一系列实现中非双方均衡发展的措施与机会，借助中国或非洲为对方创造发展的机会，强调中国和非洲在合作中的“互惠互利”，“全面综合平衡发展”^③。2006 年北京峰会期间，中国宣布成立“中非发展基金”，以股权式基金的形式作为伙伴式推进器，支持中国企业围绕非洲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开展对非直接投资。到 2013 年，中非发展基金共在非洲投资 19 亿美元，中非发展基金带动了中国企业走进非洲投资于非洲的工业、农业、基础设施、工业园区、资源开发等偏长期的投资项目^④。为了促进非洲的企

① 《赴非旅游中国游客人数大增 成非洲国家“宠儿”》，2013 年 9 月 4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9/04/c_117219888.htm。

②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31 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2010 年 12 月）》，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5 页。

④ 《中非发展基金已对非洲世纪投资 19 亿美元》，2013 年 6 月 13 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6-13/4925304.shtml>。

业和非洲的商品走进中国，中国政府于 2007 年在浙江义乌设立了“非洲小商品展销中心”，为非洲国家的小商品免费提供展位和展台。为了提高非洲企业提供融资能力，中国政府推出了“非洲中小企业发展贷款”，目前受惠国家数量达 25 个，带动了非洲的进出口贸易和非洲企业的国际化历程^①。目前，伴随着中非合作中的各类优惠措施，非洲企业具备了雄厚的实力，毛里求斯、南非、塞舌尔、尼日利亚和突尼斯成为了非洲对华投资的重要国家。南非在华的啤酒合资企业分厂有 70 多家。突尼斯与中国的合资化肥企业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复合肥基地之一^②。中国和非洲日益受益于对方的发展。

第三，中国援非话语的主语从中国向中非双方转化，越来越多地看到中非在援助中的共同发声。

从中非的话语表达结构来看，从中方的自我表述逐渐地演变成为中非双方的共同发声，非洲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中国援非和中非合作的表述当中来，日益成为与中国平行的重要发声源。1964 年周恩来发表的第一份关于中国援外的政策文件，名为“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2000 年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通过的文件名为《中非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纲要》。从文件的名称来看，前者的主语是中国，后者的主语则是中非。这一文件名称主语称谓的变化，很清晰地反映了参与到中非援助与合作关系中的主体日益具有了中非双方的身份，非洲也成为了中非合作中从实质到名义上的主体。在 2000 年召开的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上，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其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们，中国和非洲国家负责外交、对外贸易和国际合作或经济、社会事务的部长们，于 2000 年 10 月 10 日至 12 日聚首北京，出席中非关系史上的首次盛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2000 年部长级会议。”^③ 中非合作论坛公布的第一份文件的第一句话的第一个词就是“我们”，表明中国和非洲是以共同的称谓

^① 《浙江义乌新设非洲产品展销中心》，2010 年 10 月 21 日，http://district.ce.cn/zg/201010/21/t20101021_1308234.shtml 《国开行大力推进向非洲中小企业专项贷款增资 10 亿美元》，2011 年 10 月 27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0/27/c_111129119.htm。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2010 年 12 月）》，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9 页。

^③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http://www.focac.org/chn/lttda/dyjbzjhy/hywj12009/t155560.htm>。

来开启一段新的历史。

作为群体之代表的以中非为主语的表述，逐渐替代了以中国为主语的表述，成为中国援非的基本表达方式并逐步转化为中非交往中的核心表达方式。从“八项原则”和“四项原则”到《北京宣言》，虽然都在谈中非间如何交往，但主语却从中国转变成中非双方。把中非两者作为言说中非援助关系的主语，一方面，无论是中国还是非洲，都类属于一个共同的身份群体，同时更重要的是指称言说者本人是代表中非这个集体，而不是代表中国或者非洲任何一个个体在说话，所表达的内容也并非言说者一方的意志，而是言说集体共同的话语。中非合作论坛表明“中国正在寻求与非洲建立严肃的、长期而坚定的合作关系”^①。另一方面，主语从中国向中非的调整，这不仅是话语形式的转变，这一形式的变化启发了中非之间交往的思想观念和生存姿态的革新和调整。非洲跃升为中国援非话语中的主语，意味着非洲在中非关系中拥有了更加独立、自主的主动姿态，中非的援助关系从实质内容到表现形式更趋平等，非洲在中非关系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作为共同的主语，中非话语虽然表达中非的共同意志，但并非让中非所有的言行一致，而是创造机会让中非在保留个性的基础上达成某些共识，结成伙伴，实现相互扶植、互帮互助。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各个行动纲领可以看出，中非作为共同的主语而在中非合作论坛中表达出未来共同的行动。用中非取代中国作为主语的目的并不在于剥夺非洲在中非交往中的话语和权力，让非洲的声音淹没到中非共同的语言之中，而是有意识地培植中非之间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身份，让非洲更有机会表达自己真实愿望的愿望，或者让中非双方的共同愿望能够有机会得到交流和沟通。2009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埃及召开之前，中非合作论坛后续行动委员会秘书处拜会驻北京的非洲使节团，就北京峰会上的八项措施的实施和会议的准备情况征求意见。来自非洲45个国家的外交部、商业部门和财政部门的官员以及外交官参与了咨询。另一个后续行动委员会

^① Efem N. Ubi, Foreign Aid and Development in Sino-African Relations, *Journal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Vol. 30, No. 3, 2014, p. 248.

是由驻华的非洲使节与非洲国家围绕着论坛会议而组织的^①。

值得关注的是，共同主语的营造并非以这种方式泯灭中国对非洲发展的责任和义务，而是将非洲提升到更主动的地位上来。进入 21 世纪后，非洲作为援助与合作的宾语地位在逐渐地改变，这在非洲看来，其日益具有了与主语同等的地位。这一方面得益于中非之间的援助日益被合作所取代，另一方面，中国的援非从强调受援对象非洲的发展向强调中非双方的共同发展演进，援助和合作日益成为了中非双方的共同行为和相互行为。在中非合作论坛的各个文件可以看出，非洲、中国或中非成为了平行的主语，表明在现实的中非合作中，三者具有了同等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其在中非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平等。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2009 年）》，中非已经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主语，只有在特别提到中方为中非合作提供特殊的合作与援助时，才会以中方作为主语。以农业领域的合作为例，中非双方是文件暗示的主语，是今后中非双方在农业领域将要开展的合作和行动。然而，我们同时可以发现，谈到农业方面的合作举措时，中非并不是唯一的主语，当中国为非洲国家提供援助与支持时，中国依然是主语。在中国承诺的援助与合作条款中，中方变为唯一的主语，因为中方准备为非洲国家的农业发展继续提供特殊的援助与帮助，此时，非洲由主语变为了宾语^②。由此，非洲作为援助中所关注的发展主体的地位得以名至实归。

除了中非之间的平等发声，中国还竭力邀请非洲国家共同在世界发声，为在世界范围内发出非洲人对非洲事务的声音。2011 年，在中国的邀请下，南非参加到“金砖国家”的行列之中来。“金砖四国之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认为，南非加入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代表了整个非洲大陆^③。话语策略的这一调整是有意义和充分的必要性的。话语权

① Li Anshan, Liu Haifang, Pan Huaqiong, Zeng Aiping and He Wenping, *FOCAC Twelve Years Later: Achievements, Challenges and the Way Forward*, Peking University and Nordiska Afrikainstitutet, 2012, p. 32.

② 参见《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2009 年）》，2006 年 11 月 16 日，<http://www.focac.org/chn/zyzl/hywj/t280368.htm>。

③ 《南非加入“金砖四国”变五国》，2010 年 12 月 29 日，<http://www.chinanews.com/cj/2010/12-29/2754095.shtml>。

就是生存空间和发展优势,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和非洲面临着在世界体系中争取话语权的重大任务。2013年,第五届金砖峰会在南非举行,会议的主题为“金砖与非洲:发展伙伴关系,一体化和工业化”。非洲的发展被置于世界经济最有代表性的新兴国家发展的层面上来,金砖国家承诺促进非洲地区一体化,非洲也在加强金砖国家在非洲的互动^①。

共同的主语地位还让非洲在面对中国时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当中国作为主语时,非洲在中国面前是“你”,而在其他国家面前则成为“他”;而当中非作为主语时,在中国面前和在其他国家面前,中国和非洲的称谓都是一样的。非洲在中非援助话语中的地位的变化表明,非洲由一个被发展的他者真正进入发展的主体层面上来,更多、更深入、更主动地参与到发展援助的行为当中来,这一地位的变化让非洲国家更加主动而便捷地释放和发挥自身的资源、能力方面的优势。一部分域外学者一致怀着优越感、戴着“有色眼镜”研究非洲和中国,他们的结论常常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如果一味依赖既有理论和观点,用别人的“语法”和“词汇”讲述自己的故事,就难免事与愿违。

三 中国援非话语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话语历程是考察中国援非的一个特殊的视角,中国援非话语的建构给中国和非洲,乃至国际体系的话语建构带来的新的话语元素和新的话语结构。当今的中国援非不仅是一项对非事业,更是一项具有国际视野的发展事业。话语是一种战略性的资源,是中国援非实践生命力和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援非的话语建设历经半个世纪,但远未成熟。当前,中国援非话语的建设中仍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和挑战。

第一,缺少面向世界的中国援助的中国话语。话语不仅是面向中国和非洲的,而且是在世界范围内交流沟通的。虽然说,中国援非中的若干原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优势观念,如发展合作、中国模式等观念成为了中国

^① Memory Dube, “Africa: Role of Brics in African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15 July, 2014,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407161648.html>.

援助中的重要话语，但是，中国并未借这些优势而建构起国际援助领域的主流话语。更多的中国援助话语是借用西方的话语体系的话语，因而，西方的援助话语是在西方的国际援理论基础上诞生的，其理论基础并未将中国援助中的素材和案例考虑进来，因而，西方的话语无法表达和展示中国援非的全部内涵。例如中国援助以援助与合作相结合的援助方式，无论是援助还是合作都无法囊括这一特殊的援助方式的全部内涵，非洲曾有学者试图用“合作联姻”(Coalition Engagements)^①，但是因为中国缺少主动设置话语的自主性，这一话语尝试并未成功。再如西方人热捧的“北京共识”，本身是一个西方国家的学者站在自己的立场创造出来的概念。正如作者在中译版出版的时候所讲的那样，“北京共识”只是用以思考中国迅速崛起的一个框架，无法代表经由中非援助关系而建构的非洲发展之途^②。因此，学者们发现，很少有人相信，“北京共识”具有替代“华盛顿共识”的潜力，而最吹捧和推崇“北京共识”的恰恰是西方的商人^③。虽然中国和中国的学者正在亲身经历这种变化，却没有创造出一个比“北京共识”更具有概括力和话语号召力的语汇取代这一词汇，只好沿用这种表达，成为话语上的“随从”。

第二，中国话语的世界影响力不足。为什么中国在主动设置话语，却难以收到良好的话语传播效果，这主要归因于世界的媒体格局，西方媒体占有绝对主导地位，而中国的媒体处于弱势。虽然孔子学院的推行和中国媒体在非洲的落地等行动，都在尝试提升中国话语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但在西方的话语强势面前，中国话语依然处于弱势。西方媒体一方面拒绝倾听中国声音，另一方面采取“妖魔化”中国援非、有意曲解中国领导人讲话，实行“强势话语对弱势话语的吞噬”^④。有人说，中美只有在非洲问题上，中国的影响力超过美国^⑤。中国在非洲问题上的话语应该成为中国确立良好正面国际形象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成为中国话语与西方舆论

① [南非] 马丁·戴维斯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政策及评价》，曹大松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9期。

②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May 2004, p. 3.

③ Arif Dirlik, "Beijing Gongshi-Who Recognizes Whom and to What End?", Mimeo, 2006.

④ Pierre Bourdieu,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⑤ [赞比亚] 丹比萨·莫约 《援助的死亡》，王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78—79页。

博弈的重要场所。然而，非洲问题依然是西方制造谣言“妖魔化”中国的重要话题。

中非合声虽然有助于中非话语共同体的形成，增强中非在发展合作问题上的话语分贝以及话语权威性和渗透力，但中国和非洲双方的媒体对这一话语的运用和引用依然不足，援助话语的影响力并不足以打破西方的话语屏障和话语霸权。值得关注的是，中非媒体合作和中非话语共同体的有效效应仍未形成。但是，调查证明，非洲的媒体是西方媒体的一个分支而出现的。通过对赞比亚《金融时报》2013年1月至4月的统计发现，其新闻的85%以上是直接引自西方媒体，而来自中国媒体的新闻不到5%，且绝大部分是负面新闻^①。

第三，话语生产上，话语的发声源较为单一，以官方为主。近年来，随着中非非官方联系的增加和中非民间论坛、中非智库论坛等的相继推出，中非民间和学者的声音正在崛起，但分贝不强。话语生产的最重要程序是议程设置，在议程设置上，西方占据了绝对的主导权。中国不仅不能为西方媒体设置议程，甚至沦为西方的媒体“反设置议程”。例如中国在援助中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得到非洲国家的认可和赞同，而西方援助所附加的各种条件并未给非洲带来任何有意义的积极变化，而中国的不附加条件的援助却屡受西方国家的责难和批评。西方学者称中国的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是一种“流氓援助”^②。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称中国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破坏了美国在非洲民主和人权方面的努力”^③。未来的话语竞争中，应该增强反向设置议程的能力，争取从议程设置上找到突破口。中国纳入他们的话语体系当中，中国缺少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能力。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建设性的、更为融入的参与者。……人们希望中国日益感到他们也是成功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④。中国虽然也提出要成为“负责任大国”，但却没有对“负责任大国”给出中国特色和中国气度的定义，让西方国家以自己的标准

① 笔者对赞比亚主流报纸《金融时报》涉华新闻的统计数据，2013年5月。

② Axel Drehe and Andreas Fuchs, *Rogue Aid?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Aid Allocation*, CESifo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581, September 22, 2011.

③ Katrina Manson, *China Attacks Clinton's Africa Comments*, Financial Times, August 3, 2012.

④ 袁鹏《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OL，东方早报网站，2005-12-23。

定义“负责任大国”，质疑中国在非洲的外交目标和发展援助，造成了此后的一系列外交被动。例如，在苏丹的和平和稳定问题上，中国方面认为，发展是解决苏丹问题的根本途径，因而试图解决当地人的饮水、医疗、上学等问题，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西方媒体对此几乎没有提及，反而强调中国在苏丹的合作举动破坏了和平，“负责任”只不过是一个“伪善的幌子”^①。在非洲发展问题上，西方视而不见中国援助的优势与特点，设立所谓环境标准、劳工标准、企业社会责任等一系列西方式的议题来评价和指责中国援助，面对强大的话语声势，中国援助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削足适履”。

第四，应对突发事件的紧急预案缺失，特别是应对西方挑拨的反击机制不足。当前中国的话语策略以宣传为主，缺少与世界展开对话与沟通的常规通道和手段。例如：西方爆料中国在安哥拉所建的医院，在投入使用后不久墙壁上就出现了裂缝；中国投资建设的赞比亚的公路在建成后不久便被雨水冲走，等等^②。一时间，关于中国援助项目的质量问题的讨论风靡网络，而中国方面却无法有效发出应对的声音。在这些可能引起话语争端的领域，中国方面的学术积累也相当薄弱，因而，在可能做出回应的时机也无法做出有理有据的回应。围绕着某些可能议程的学术问题，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某些负面议程的研究很少，这势必造成在中国面临国际话语冲击之时，中国无法适时地抛出更吸引眼球的重磅炸弹，及时为中国的话语危机解围。

(责任编辑：舒展)

^① China's Potential Mediation Role in the South Sudan Conflict, Jan 15, 2014, <http://blogs.lse.ac.uk/africaatlse/2014/01/15/chinas-potential-mediation-role-in-the-south-sudan-conflict/>

^② “Trying to Pull Together: Africans Are Asking Whether China is Making Their Lunch or Eating It”, The Economist, 20 April 2011.

Key Words: BITs; China-Africa; investment; investor; dispute settlement

Author: ZHU Weidong , Ph. D. and Professor of the Institute of Law and Politics ,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African Law and Development ,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Deputy-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African Law and Society , Xiangtan University (Zip code: 266100) .

AFRICAN ECONOMY

Who Is the “Bellwether” in Africa: South Africa or Nigeri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released in April , 2014 , Nigeria has risen to the largest economy in Africa , which has aroused the contention about who is the leader of African economy: South Africa or Nigeria.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background , caus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come statistics in Nigeria and evaluates the credibility of the report , concluding that this report is reliable. Next ,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s of the rise of Nigeria upon the status of South Africa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regional power” , arguing that it is unlikely for Nigeria to overtake South Africa in the short run , although Nigeria would become the bellwether of Sub-Saharan Africa.

Key words: South Africa; Nigeria; Africa; leader

Author: LIU Qinghai ,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African Economy ,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Zip code: 321004)

China’ s Foreign Assistance Discourse: History and Dilemma

Abstract: In the fifty eight year long history of foreign assistance , there has been a transition from political discourse to development discourse. This characteristic coincides with the changed function of China’ s assistance from political tool to cooperative platform and then to development instrument. Specifically , the discourse has changed from silence to monologue and eventually to ensemble. It is both classical and original. The subject of the discourse used to be China , but it is increasingly both China and Africa. With this change , China and African are forming a discourse community. However , China’ s dis-

course on assistance is severely challenged due to lack of global discourse power and flaws in discourse production and strategy.

Key words: foreign assistance; discourse; Sino-African relations

Author: HU Mei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Zip code: 321004)

Labor Issues and Sino-African Diplomatic Relations

Abstract: As more and more Chinese enterprises invest in Africa , the number of labor disputes in these firms has been on the rise. Although these issues are concerned with the behaviors of a small percentag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Africa , they have made a negative im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 and even affected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It is quite necessary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fix the problematic firms. Based upon information and data collected during the past seven years ,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ommon mistakes made by Chinese firms with regard to labor relations , and then investigates the causes for these mistakes , and at length proposes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ement. The basic argument is that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regul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behaviors in Africa by Chinese government benefit the long-term overall interests of both firms and the country.

Key words: Labor issues; Sino-African relations; law; overseas supervision

Author: TANG Xiaoyang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Zip code: 100083) .

Review and Comment of Nigeria' s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cess in a Century

Abstract: Since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in 1914 , The development of Nigerian economy has past one hundred years. "Indirect rule" , "pan-Africanism" , "colonial heritage" and "autonomy" are the four core theoretical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throughout Niger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 Nigeria has been us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